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王日根 主编

# 厦门的兴起

【新加坡】吴振强 著

詹朝霞

胡舒扬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厦门的兴起

【新加坡】吴振强 著

詹朝霞

胡舒扬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厦门的兴起/(新加坡)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12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5-7105-7

I. ①厦… II. ①吴… ②詹… ③胡… III. ①厦门—地方史—清代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012 号

Copyright © Ng Chin-keong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NUS Press, Singapore

版权登记图字:13-2018-019

---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章木良 薛鹏志  
封面设计 夏 林  
电脑制作 张雨秋  
技术编辑 朱 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20 千字  
插图 4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6.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econd Edition)*

*Ng Chin-keong*



NUS PRESS  
SINGAPORE

吴振强著

厦门的兴起

潘多



*To my parents*

献给我的父母

#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 总 序

海上丝绸之路是自汉代起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联络的海上通道,主要包括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和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港口、造船、航海技术、航线、货品贸易、外贸管理体制、人员往来、民俗信仰等诸多内容,成为以往中外关系史、航运史、华侨史乃至社会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当然所谓“热点”,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冷热变化。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姚莹、魏源、徐继畲、梁廷枏、夏燮等已开始思索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海上关系问题,力图从历史的梳理中寻找走向未来的路。此时,中国开辟的和平、平等的海上丝绸之路何以被西方殖民、霸权的大航海之路所取代?中国是否应该建立起代表官方意志的海军力量,用于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保证中国海商贸易的利益?

随着20世纪中外海上交通史学科的建立,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诸多开拓性的研究。泉州后渚港宋代沉船的出土再度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股研究热潮,庄为玠、韩振华、吴文良等学者在这方面表现显著。20世纪80年代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又获得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制度演变、私人海上贸易、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贸易商品和贸易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进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研究逐渐明显地被纳入到“海洋强国”战略之中,先是有包括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扬州、南京、登州、北海在内的诸多沿海港口的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启动,继而有海洋

考古内容丰富的挖掘成果,接着是建设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政策引导,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该领域研究更强劲的动员令。

从海上丝绸之路百年研究史中,我们能清晰地体会到其间反复经历着认同中华文明与认同西方文明的历史转换,亦反复经历着接受中国与孤立中国的话语变迁。

从经济贸易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物资交流通道,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和铜铁器纷纷输出到海外各国,海外各国的珍奇异兽等亦纷纷输入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人群频有变幻,阿拉伯人、波斯商人是截至南宋为止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角,时至明代,中国的大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乃至宁波商人、山东商人等等都纷纷走进利厚的海贸领域,他们不仅主导着中外货品的贸易,而且还多次与早先进入东亚海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直至日本的海上拓殖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或收复台湾,或主导着澳门的早期开发。时至清代,中西海上力量在亚洲海域互有竞争与合作,冲突有时也会特别地激烈。中国的海上贸易力量在西方先进的轮船面前日益失去优势,走向了被动挨打的境地,但民间小股的海商、海盗乃至渔民仍然延续着哪怕是处于地下状态的海洋贸易,推动着世界范围内的物资交流与汇通。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货物的流动本身已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东亚邻国日本对“唐物”充满敬佩与崇拜,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亦痴迷中国历代的书画及各种工艺,因此,伴随着丝绸、陶瓷等的向外输出,优秀的中华文化亦反复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

在既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或着眼于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或着眼于港口地名的考辨、航海技术的使用与进步,或着眼于各朝海疆疆域、海洋主权的维护等内容,这些或被纳入中外关系史学科,或被定义为边疆史地研究,缺乏整体系统的全面把握。

重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是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下的具体而微,这标志着中国将重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业已悠久存在的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谐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互摄关系以及国与国之间友好的民间交往等等,历史的梳理便于唤起人们对共同文化理念的笃信,便于彼此重温既往共同精神纽带之缔结的机理,历史传统可以历经岁月的淘洗而显得清晰,亦势必将主宰人们的心理倾向和处世态度。

因此抓住重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契机,认真开展历史上海上

丝绸之路的人文思索和挖掘,其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都是不可小视的。借着国家“一带一路”策略的东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了新的再出发阶段。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相比,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似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理应回归到更加理性的层面,思索在海上丝绸之路早期阶段中国话语权的树立,思索海上丝绸之路顿挫时期中国海洋话语权的失落,思索当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时我们在文化上、历史中可以寻找到的本土资源,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弘扬儒家“仁”、“和”、“协同万方”思想,为新时期人类和谐、和平、合作开发利用和开发海洋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

如今,包括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扬州、南京、登州、北海在内的九个港口城市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城市的港口史研究均能被称为申遗的重要佐证。

如今,海洋考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诸多的沉船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丰赡翔实的资料来源。

如今,若干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史料的调查、汇集与整理为我们开展专题性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海上丝绸之路系列丛书的面世将能够向世人充分展示海上丝绸之路更加丰富的历史面貌,揭示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代贸易的实态、参与人群及其生活方式、海洋贸易及其管理制度状况等,从而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有更进一步的呈现,为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一份资鉴。

王日根

2016年12月

# 中文版序

19 世纪新加坡华族在当地人口统计中分为福、潮、广府等帮，以福建帮人数最多，商业影响力也最大。福建帮以操厦门语系的漳泉人为主。当时福建会馆的领导班子为商人，有如明清时代中国主要商埠的漳泉或泉漳会馆。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在思考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时，选择了这个族群南来的历史。经过追根溯源后，论文聚焦于明代后半期的闽南地区，讲述闽南农村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沿海绅商和农民小商贩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月港（后设海澄县）时代葡萄牙人与当地官绅小民之间的合作与斗争三大板块。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心里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月港衰退后，经历了明清之际长达数十年的动乱和海禁，中国海上商贸是否又进入泉州、月港之后的另一个衰退周期？很自然的，厦门港进入了视野，于是我便采用了《厦门的兴起》这个题目。论文完成于 1980 年年初。为了更好地凸显全文的讨论重点，把题目改为《贸易与社会：1683—1735 年中国沿海的厦门网络》(*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中文译名仍保留了原先拟定的《厦门的兴起》。

厦门如同许多海港城市，是一个与商贸密不可分的移民社会。它是闽南商人往外发展的基地，也是闽南人从农村走向海外的中转站。闽南农村社会文化和城镇的商业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形成具有城乡文化双重性且极具活力的商贸文化，也是外地漳泉商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的文化基础，使得他们在高度竞争的各个港口社会立足，并且构建了广阔的漳泉商贸网络。这是英文书名的几个关键词所要反映的内容。

《厦门的兴起》在 1983 年推出首版。在 2015 年重印时，只在文字上做了一些更动，内容并没有任何修订，保留了此书原貌。自此书第一版面市以来，有关福建和厦门的研究收获丰硕，与四十年前对厦门的认识不可同日而

语。因此,此书只是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十分期待一本更为深入和完整的厦门史早日出现。

此书出版后,曾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恰在此时,西方学界对唐宋以来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观察,认为17世纪初之前,中国的航海事业可以划分为泉州和月港两个活跃的周期。但从政局动荡的明清之际开始,中国的海洋活动终于停滞,进入了长达两百余年的“黑暗时代”,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得以摆脱闭关自守的羁绊,重与海洋接触。此书所呈现的却是一个海洋活动的高潮。这种说法也不是首创,田汝康前辈早在1957年发表了有关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贸易的著作,勾画出活跃的帆船贸易图景。《厦门的兴起》引起注意的另一个原因,相信是此书以宏观视角和网络的构建来看厦门的发展。前面已经说明,撰写过程并没有先带上这个概念,而是在追踪厦门的发展后,才发现厦门的发展与网络的构建密不可分。此书带出许多仍需讨论的问题。就以商贸网络为例,此书只做了概括性的描述。以今天的研究条件来说,可以在许多细节上做深入的挖掘。作为一个贸易港,网络的结构是十分复杂的。网络这个概念,指的是连接性。数世纪以来的西方商业史和近数十年来社会人类学的著作中常用这个概念来讨论商业活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讨论海外华人的商业行为和东亚(含东南亚)的华人商贸活动时,更是广泛地应用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贸易港,连接性不仅是港与港之间的联系,仍需补上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港口和内陆腹地的联通。内陆腹地提供了市场和货源,是一个港口发展的基础。

这本书写作时,我并没有到过厦门。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那时的客观条件下,厦门的确遥不可及,更谈不上到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资料。我首次访华是在1985年,那是一个到厦大做学术交流的机会。我方由南洋学会六位会员组成,厦大接待方是当时的南洋研究所。整个行程的安排是与南洋所老中青三代学人见个面,还谈不上深入的学术交流。由于个人对福建研究和海洋史相关课题的关注,除了和所里的韩振华前辈有较多的谈话外,也得到安排拜见了傅衣凌、庄为玑、陈诗启几位前辈学人和方志办的洪卜仁、历史学者方文图两位先生。

当时在静养中的傅老欣然给予接见。交谈中,我提及1970年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复印了傅老写于1944年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从考》一书。他听后十分惊讶,三十来岁时的著作竟然珍藏在地球的另一边。他得知我的来

意后，随手写下几位老中青学人的名字，并简单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概况。我至今仍珍藏着傅老手书的纸片。在告别时刻，傅老惠赠了《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的签名抽印本。在傅老安排下，和厦大几位中青代的学人做了交流，他们在这三四十年来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南洋所同仁带领下，渡海到鼓浪屿拜见了陈诗启老前辈。在厦门的短暂逗留期间，有幸参加了厦门海关学会的成立大典；也见到了厦大图书馆的陈三畏先生，并蒙惠赠墨宝。访问尾声匆匆来到了泉州，当地的学者带我看了几处海交史的遗迹，亲睹了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发掘的宋代海船。

四日的日程从早到晚安排得十分紧凑。返新后陈诗启前辈还不时寄赠多种海关史出版物。韩振华先生后来在他从荷兰莱登大学返国途经新加坡时，给我带来了从莱登汉学图书馆复印的《鹭江志》残本，这是我寻找多年的古文献。1985年，方文图先生寄来了一本《月港研究论文集》。

如今新中往来通畅，无法想象当年得以近距离接触厦门时的兴奋。

《厦门的兴起》曾由李金明先生翻译了“厦门的兴起”和“厦门的沿海贸易网络”等章节，发表在《厦门方志通讯》1986年第1—4期。但我读到这几篇译作还是在它们发表后的20余年后，当时洪老来新访问并带来了这几期的通讯。

这次《厦门的兴起》一书的全文中译，并编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全仰仗日根先生的抬举和安排，又得到厦门市社科院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詹朝霞先生和日根先生的博士生胡舒扬先生共同翻译，章木良、薛鹏志两位老师为责任编辑，由厦大出版社出版，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日根先生还在最后定稿前将译稿寄给我审读，我便花了20天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全面的审读，校正了一些小的瑕疵。在译文即将完成和付梓之际，日根先生来函嘱咐写篇译序，就借此也谈了我和福建以及厦门的学术情缘，并向当年关心我的厦门学术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吴振强

2018年11月

# 英文版再版序

这部专著于30年前首次出版。当出版社建议再版,以便呈现给新一代读者时,我同意了,希望以此激励新一代学人在新史料和新视角的基础上推动该主题的研究。

本书以中国地方志、清代档案和明清史料为基础,考察帝国晚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地区之社会经济变迁。海洋是这一次级区域农村人口的“稻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提供了一种替代农业的方法,以及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在本书所论述的时期,由于闽南商人从事跨境的长途贸易,港口城市厦门成为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这一过程是整个中国沿海贸易网络广泛扩张的一部分,需要当地官员和士绅的默许支持,并于其有利,于乡土社会有益。

闽南人的海上事业范围不仅包括中国沿海,还包括今天的东南亚海域,即中国所说的南洋。本研究只涵盖华南沿岸地区,但须全面考虑海外贸易活动。

要了解闽南人的贸易网络,就需要研究四个相互关联的活动领域,即传统农村社会、港口城市、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主题的各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

傅衣凌开创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先河,特别是福建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他的著作跨越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长达50年的研究周期,成就卓著。

如商品贸易和销售活动的增长所显示的那样,海上贸易的扩大可以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得到更好的解释,因为它与经济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了明清时期新兴的手工业,作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探索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70—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农村—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城市中心的扩张。这些中心位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定义的覆盖了晚期中华帝国大部分地区的宏观

区域。

松浦章(Akira Matsuura)关于中国海港和沿海航运的杰作是数十年深入研究的产物,揭示了埋藏于庞大的中国文献中的大量信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田汝康在沿海和海外帆船贸易方面的开创性著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詹妮弗·W. 库什曼(Jennifer W. Cushman)和吴汉泉(Sarasin Viraphol)对闽南人和潮州人开展的中暹海上贸易进行了出色的研究。潮州人来自毗邻福建南部的粤东地区,18世纪末在暹罗的帆船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这两大商人集团既合作又竞争,为南洋贸易的繁荣做出贡献。他们是中国南海地区的主要参与者,使得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称该地区的18世纪为“中国世纪”。

关于闽南人和潮州人的海上事业还有许多研究要做。除了在北京和台北的中文档案资料外,欧美档案中也有零散的记录,包括西方商人或参与中国贸易的贸易公司人员的信件、报告、账簿等。这项任务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如范岱克(Paul A. Van Dyke)关于1700—1845年间广州贸易的典范研究。

本书提供了这一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的基本介绍,只不过是了解中国海上贸易历史的粗浅一步。此课题许多方面仍显粗略,有待研究者搜寻档案,填补空白。

除了编辑上的改进,本书没有尝试更新数据或考虑过去30年中所做的新的研究。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另起炉灶。

吴振强

2014年8月

# 1983 年初版序

此项对厦门商人的研究,为 18 世纪及之后他们在东南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背景。在中国以外,福建省与广东省一直被视为南部和西部的最早的海外接触点。更近些时候,它们也是东南亚以及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等遥远大陆的种植园和采矿殖民地的贸易商和苦力来源。可以肯定地说,到 20 世纪,这两个省的几乎每一个县(福建超过 60 个,广东超过 90 个)都为外界提供了移民,并且沿海每一个村落都有一些人定居海外。

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发展,主要发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百年间。它已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并产生了各种解释。解释范围从对中国历史上的南迁的广义解读,到促使某些人背井离乡的个人悲剧和创业投机的生动个案。但整体情况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南方扩张”的画卷,“中国向热带挺进”,数百万中国人不可阻挡地冲出南部海岸的边缘;另一方面,帝国于 14 世纪末实行对移民和海外旅行的禁令,直到 1893 年在名义上仍在执行。这一禁令也得到中国人不离故土观念的支持;得到由紧密的亲属关系,特别是孝敬父母所维系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的支持。

两种观点各有其是。很明显,福建和广东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很少有人与外国人有过直接接触。但是,帝国禁令在大多数情况下显然是无效的,当饥荒发生和政权崩溃时,儒家的理想世界就无法维持。因此,去留皆有压力,二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我们所缺乏的是对这两个南方省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在帝国禁令和儒家理想世界框架下所从事的多方面活动的更好的理解,虽然也正是这些活动造成了最终出国并定居的压力。吴振强博士关于厦门和闽南的研究,是提高这方面认识的一项重要工作。

吴振强博士选择了一个重要时期进行详加考察。1683 年,清朝最终对福建人,尤其是郑成功的支持者及其在厦门和台湾的后继者实现控制。清政府第一次有权力刺激和规范他们的海上活动,或根据帝国的安全利益加

以限制。到了这一时期末尾,1735年,朝廷终于与充满打拼精神的福建人达成妥协,使他们在追随自己的贸易和工业本能的同时,仍能遵纪守法。因此,当政者灵活的政策和基层民间领袖的合作,稳步推进了帝国和地区的经济利益。

对于闽南商人来说,这是一个机遇期。他们早期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菲律宾和婆罗洲北部,在泰国南部和马来州,以及在爪哇北岸的贸易基地的努力,由于福建叛军和清军之间的长期斗争而受到阻碍。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漳州府和泉州府家乡的营商环境未能稳定下来,阻碍了他们在中国的贸易活动。许多福建商人成为郑成功政治事业的牺牲品;还有许多人被迫依赖东南亚本地贸易或与日本的贸易,而失去一个可靠的中国市场,至少可以说是让他们的海外生活岌岌可危。因此,郑成功政权的结束可能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种解脱,现在他们可以希望恢复与中国国内传统市场的贸易关系。

吴振强博士的研究集中于福建人如何在40年的混乱之后,快速复苏经济。他从农业开始,追溯福建农民如何适应社会,以应对地少人多的问题。宗族组织的创造性运用是厦门新交易网的关键。这类组织不限于亲属关系,特别是对那些不得不与大宗族竞争的小姓氏团体而言。反过来,在贸易上被证明如此有效的非亲属方式,使福建人可以轻易地发展他们自己的各种秘密社团,支持他们在中国沿海和海外的贸易和移民。对福建海外贸易特别重要的是移民台湾的经历,以及大米和蔗糖贸易的广泛网络,这对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在1735年之后的世纪中,二者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无此经历,福建人在面对19世纪东南亚快速变化的环境时将更加困难重重。

另外,他们随时可以进入台湾和中国沿海以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福建人很少卷入1850年后亚洲以外的黄金热和对苦力的无止境追求,而宁愿专注于他们在东南亚原有的贸易中心: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岛屿。这儿是他们熟悉的土地。他们在日常沟通、当地知识和数世纪东南亚贸易产品的专业化方面具有优势。这些都为闽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厦门的兴起所证实。

这项研究首次对福建商人(包括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在不利情况下如何保持活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与贪婪而蛮横的中国官僚打交道的经验如何帮助他们在其他地方与类似的殖民地和本土官员打交道,以及他们的创新能力如何帮助他们保持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中的统

治地位。无疑,对广东其他大语言族群(如潮州人、广东人和客家人)的类似研究将使关于东南亚地区的其他中国商人和移民的成败比较最终成为可能。这些仍待研究。同时,所有对海外华侨华人近代史感兴趣者都将发现这一对厦门商人的研究富有启发意义。

王康武

堪培拉

1982年9月